

孔子

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(下)



三、君子之礼的失败

回到孔子与鲁国，他认为周人的“明王”之道在西周末期陷入衰退，而他所在的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，具有周初之礼复兴的最后可能性。这是他积极入世，希望通过参政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的根本原因。

然而，他或许无从意识到，春秋各国所作出的选择，与他身处的宏大时代相互交织。孔子身在山东半岛西部的鲁国，处在东亚人类迁移的交汇点上，沿着东部海岸线，吴国正在北进，破灭了孔子仕齐景公的可能。沿着黄河，晋国正在东压，让卫国无暇接受孔子的建议。而楚国沿着淮河向东前行，让陈国也供养不起孔子一行。位于黄河最下游的齐国被这三股势力压迫，时不时还要反弹到鲁国一下，让鲁国成为“四股”力量抗衡的“受力点”。

孔子治学、参

政的出发点与鲁国的三桓有关。三桓的强势，僭越了鲁侯原本的权威，使原本的君臣之礼名存实亡。而这种状况既无法全部归咎于三桓，又不能游离于鲁国所面临的局势之外。事实上，由于鲁国夹在几股力量的漩涡之中，鲁侯左支右绌无能为力，只能依靠国内现有的几大贵族。比如，前645年楚国伐徐，孟氏的公孙敖就以鲁国主帅身份领兵救徐。由于强敌环伺，领兵的贵族往往不及卸任，就将再度领兵出征，使得军事权力（及相应的征赋权）逐渐固定聚集在对应的家族手上，如此一来，鲁侯的可控人口就渐少，势力也日逊于三桓。（与鲁国相反的例子则是齐国，“高、国、鲍、晏”等公族因外战而凋零，给了移入的田氏取齐之机。）这样的局面，非一蹴而就，成为孔子在鲁国施政时无法打破的僵局。

孔子离开鲁国前往卫国，希望能在这

个鲁国的同姓国家得到重用，但只留下对卫灵公的糟糕评价。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在于，时值齐、鲁、郑、卫等东方国家抵御西面晋国的行动正在进行之中，卫灵公所关心的只是“军旅之事”，而孔子自认所能提供的“俎豆之事”，大抵只有改善“礼乐不兴、刑罚不中”的作用。

当然，旅卫之行，给了孔子重要的启发，使他感悟在强调“礼乐刑罚”之前，更应该建立让国家与百姓富裕的基础。所以，等孔子周游列国归来，再次回到鲁国，鲁哀公问政于他时，孔子不再急于“礼乐”的施政方案，而提出了更加务实的举措：“政之急者，莫大乎使且寿也。”而当哀公又问，如何保证“民富且寿”时，孔子给出了这样的方案：“省力役，薄赋敛，则民富矣；敦礼教，远罪疾，则民寿矣。”

鲁哀公并非不懂“轻徭薄赋、敦礼远罪”能使“民富且寿”的道理，然而为何知之而不为，非不愿也，是不能也。其中道理，他不好意思再问孔子，只能向孔子的弟子有若讨教“年饥，用不足，如何？”面对粮食有限、国用不足的状况，有若提出了进一步减税的方案，并大义凛然对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？”

百姓足则国家足的道理不假，然而当鲁国接二连三遭遇征战时，供给不足便不再是国君单方面所能控制的。就在孔子与弟子们返回鲁国之前，正值（前488年）“吴来征百牢”，（前487年）吴国伐鲁，（前484年）鲁国联吴伐齐、战于艾陵等一系列大规模战事的发生。这些频繁的人力、物力支出，便以“年饥，用不足”的形式不断加诸鲁国的社会生产体系，而这显然不是“君孰与足”这样的文字游戏可以解决的了。

频繁的支出，让鲁国上下都只能以增税而非减税作为主要应对手段。这边，鲁哀公将“省力役，薄赋敛”放之一旁，把原本十分之一的田税增加到十分之二；另一边，季孙氏也开

始“用田赋”。在此之前，季康子专门让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。孔子表示，“君子之行也，度于礼，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”，但季氏也没有接受，开征田赋，为国增收。而这一年鲁国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与吴国联合，在艾陵之战中击败了齐国。

在这场角逐中，没有遵守“君子之礼”的鲁国，击败了宿敌齐国，也击败了那个追求“君子之礼”的孔子。孔子曾经希望通过恢复周公之礼来使鲁国复兴，但他没有成功，而他即将走向生命尽头之际，未能“守礼”的鲁国君臣却收获了一场难得的胜利。这一切也可以说，是“求变”的鲁国，战胜了“守旧”的鲁国。

此后的孔子以“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的心态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岁月。（完）

凤凰资讯

